

# 2023 年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湖南卷）

## 历史试题

### 史料来源和试题解析（材料题部分）

鲍鹭滨史料汇编团队 鲍鹭滨

#### 【真题呈现】

18.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6 分）

#### 材料

1919 年 12 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 50 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 年 1 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 64 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 12 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 8 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〇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16 分）

本题的原文出处是李国芳：《一九二〇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中共党史研究 2021 年第 5 期。以下重点围绕本论文内容展开解析。

## 【时代背景】

近代以降，为了摆脱落后挨打局面，中国人“师夷长技”，掀起一波又一波学习西方的浪潮。西方工业化的经验乃至矫治工业化弊病的主张，一股脑儿地涌入中国。特别是到1920年前后，道术为天下裂，思想奔涌，道理繁多。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究竟是首先兴办近代工商企业、实现工业化、增进国民财富呢？还是从创办近代实业之始，就着手改善劳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以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出现的贫富分化、劳资斗争、经济危机等“遍地荆棘”的前途呢？前一条道路，普罗大众似乎必须忍受长工时、低工资、劣待遇，确实比较“血腥”，不够人道；后一条道路，符合公正、平等的人类心理，近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念，似乎更为理想。这种因西方社会劳资矛盾激化而引发的类似的“道路”之争，百余年来，恰似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连续剧，始终不休。其中，1920年上半年围绕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长沙招募女工而发生的社会争议，可谓这类议题的序幕。

——李国芳：《一九二〇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 【试题解析】

### 一、国内外背景分析

#### 背景一：西方工业化后的社会问题以及解决措施

##### 材料一：贫富差距、环境污染、治安犯罪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工业革命不但产生了工人阶级，而且也给工人阶级带来苦难。在工厂里，工人变成了机器的简单的附属品，他们跟随着机器运转，而失去了劳动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因为工作单调乏味，很不利于工人的身心健康。机器的采用，也把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卷进劳动力市场。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21.9万工人中，13岁以下的儿童占4.9万，13岁至18岁的少年占6.6万，成年妇女占6.7万，由于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由于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源源不断地流入无产者的行列，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于是工厂主竭力压低工资。1810年英国纺织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为42先令6便士，1825年又下降到25先令6便士。

在工人住宅区，房屋简陋，天空浓烟密布，街道狭窄拥挤。在英国，有的工人家庭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矮小的房屋里。兰开夏有的工人家“是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条腿的圆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有两条脏床单。”以法国里昂工人为例，他们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8小时，得来的工资还不能换取一磅面包。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下卷

城市化加剧了环境污染。矿物燃料如木材和煤被广泛使用，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化学物质和粉尘。污染的生活供水和不卫生的居住条件导致了传染病的流行，霍乱、伤寒、痢疾与肺结核都是城市中常见的疾病。直到19世纪的后半叶，城市仍然是危险的地区，死亡率通常超过出生率，只是从乡村源源不断涌入的人口维持着城市的繁荣。

城市生活能够提供的舒适和安全程度取决于收入的多寡。富人在新发展起来的郊区建起典雅漂亮的房子，并隐居起来，试图最大限度地把自己与城市带来的不舒适隔绝开。大量人口涌入像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急速发展的工业城市，工厂周边迅速搭建起简易住房。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占据了拥挤的设施不全的公寓，那里毫无舒适可言。公寓里空间狭小，很多人不得不挤在一张床上，增加了乱伦的可能性，也便利了疾病的传播。房子外面没有开阔地，仅有的一点地方通常是臭气熏天的猪圈，或者就是臭水坑和粪池。根据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短短的37年中，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犯罪数字竟增加了6倍多。

——摘编自【美】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第五版）：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750年至今）

在不到100万人口的伦敦，就有小偷1万余人，白天乞丐成群，晚上则明火执仗地抢劫。

——摘编自董正华：《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

##### 材料二：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

1827年，23岁结婚的贝蒂·哈里斯在婚后不久就在英国曼彻斯特附近一家煤矿找到了拖运工的工作，每个工作日，她都要绑着腰带和链子（用于拉煤），沿着狭窄的坑道把坑底的煤拖到地面上，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工作12个小时，甚至怀孕的时候也这样，只在午饭时候休息一个小时，吃面包和黄油。和她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其他妇女和男性工人、孩子。

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说服政府革除早期工业化的弊端、为工人阶级提供保障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议会禁止雇佣妇女以及 10 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像拖煤工贝蒂·哈里斯那样的井下工作，保证 9 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工作不超过 9 小时。在公开选举和工会的压力下，政府越来越接受这样的观念，即国家应负责公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从 19 世纪末开始，欧洲国家在德国的率先示范下，采纳了社会改革方案，引入了失业补偿金、最低工资法、以及疾病、事故和失业保障，对工作时间和条件也做了规定。这些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前奏。德国在 1883 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疾病保险法》，1884 年通过《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 年实行《老年与残疾保险法》，这三个法律使德国第一个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的国家，构建了一个保证社会安全和社会持续均衡发展的高级社会安全网。

——摘编自【美】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第五版）：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750 年至今）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根据统计学会会刊的材料，在 1840 年，5366 个工人家庭住了 5294 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 26830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面对严峻的城市住房问题，19 世纪的伦敦出现了一种创新的“模范住宅”形式，风行一时。所谓“模范住宅”是指在住房结构、设施和舒适度等方面符合住房立法所规定的最低标准，适合工人租赁居住的住房。

在 19 世纪 40 年代，伦敦的两个慈善组织“大都市改善勤劳阶层住宅协会”和“改善劳工阶级生活状况协会”率先进入工人阶级住房领域。模范住宅形式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政府的大力支持。1849 年 10 月，伦敦第一任公共卫生医务官约翰·西蒙在《关于伦敦城公共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提出，“要求城市行动起来，消灭贫民窟，为穷人建造模范住宅”。1866 年，英国政府开始向慈善住房机构提供贷款，利息为 4%，期限为 40 年；到 1875 年，累计为模范住宅公司提供贷款 25 万英镑。

模范住宅不是普通的商品住房，而是具有一定社会福利色彩的住房。模范住宅公司是基于慈善理念参与住房建设与管理的，它们的利润大致保持在 5% 左右，号称“百分之五慈善”。这些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王室赞助、政府贷款以及民间投资。在 1855 年以后，伦敦工程委员会将贫民窟清理以后腾出的空地优先提供给模范住宅公司，并督促这些公司在原址建造工人住宅，为工人阶级提供住房。

——摘编自张卫良：《西方城市史》

材料解析：工业化后尖锐的阶级对立严重威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迫使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立法措施，构建社会福利体系来提高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尤其对妇女儿童采取立法保护。这些措施客观上推动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民主化、法制化，有利于社会进步，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社会弊端。

## 背景二：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

### 材料一：早期工人运动与宪章运动

因此，工人阶级被迫起来斗争。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斗争采取了破坏机器的斗争方式，这是因为当时工人觉悟很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造成灾难的根源不是机器，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破坏机器运动最早发生在英国，当时称作“卢德运动”。

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特别是觉悟的提高，工人开始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在英国，19 世纪初就出现工人的组织，并且争取到工人的结社权利。到处都出现工会组织。工会领导了 1825 年开始的罢工斗争。工人阶级还用武装斗争去反击资本家的剥削。在 19 世纪前半期最著名的工人起义是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下卷

宪章运动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的目标是要通过实行普选制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像这样的形式和性质的运动，只有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代才可能发展。在 30 年代初到 50 年代，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如 1832 年议会改革的斗争，1846 年废除谷物法的斗争，1847 年争取 10 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849—1852 年资产阶级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展开的反攻等。在这样的条件下，宪章运动得以号召群众广泛开展斗争，使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发展。但是自从 1848 年以后，英国社会历史已开始发生变化，在以后的 20 年中，英国的经济走向高涨，减少了失业，工人生活得到改善。虽然也发生了 1857 年和 1866 年两次经济危机，但持续的时间比以前短，英国很快就从危机中恢复了过来。

另外，宪章运动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它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变革，在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去加以实现，而工人阶级本身也没有达到足以担当实现这些任务的水平。它缺乏组织性，没有统一的政党，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工人队伍中产业工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来自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或破产农民，他们留恋过去的小生产者地位，在斗争中不够坚定，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所吸引。而他们要对付的资产阶级，却正在发展之中，而且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和经济管理才能。在 1832 年议会改革之后，工业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新老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与工人阶级为敌。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英国历史及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的独立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在宪章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英国，他们同宪章派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并研究了它的经验，这对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发生了重要影响。宪章派的斗争也为当时英国劳动人民争取到一些胜利，如 1846 年谷物法的废除，1847 年的 10 小时工作制等。而且，由于宪章运动声势浩大，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每当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为了避免宪章运动的重演，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另外，宪章运动失败后，数以千计的运动参加者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也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当中有些人迁居到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把民主思想的种子带到了这些地方，为这些地方民主运动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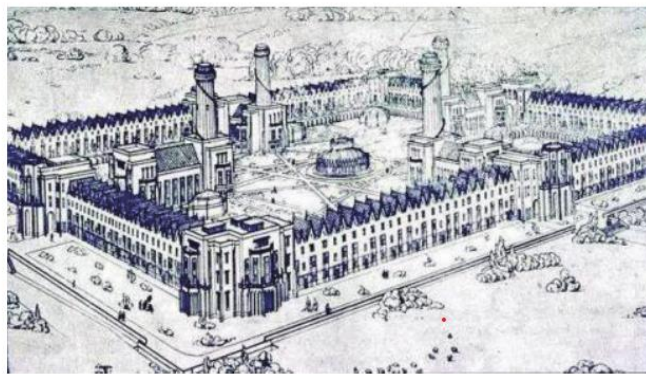
### 材料二：空想社会主义

在早期工业社会的诸多批评中，社会主义者的声音最为响亮也最有影响力。社会主义者致力于减轻由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认为在工业巨头与普通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异，因此痛心于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声讨允许劳动剥削存在的制度，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发展了启蒙思想对平等的理解和认识，认为平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期待在未来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持有这个基本观点。然而他们对于什么才是建立并巩固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佳道路却各持己见。

——摘编自【美】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第五版）：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750 年至今）

“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 1830 年，是指社会批评家查尔斯·傅立叶（1772—1837）和罗伯特·欧文（1771—1858）的思想。傅立叶、欧文和他们的追随者经常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建立平等社会的模范社区。傅立叶的大半生是作为商人渡过的，但他却厌恶市场竞争，呼吁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需求的社会改革。他辛勤地创建模范社区，这些社区是因友爱而团结在一起的，这里没有强权，人们出于自愿和喜好履行自己的工作义务。欧文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把一个名叫新拉纳克的贫穷的苏格兰棉纺织城，改造成一个模范工业社区。在新拉纳克，欧文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由 17 小时减少到 10 小时，建造宽敞的房屋并且开了一家以公平价格出售商品的商店。除去这些改革的成本，新拉纳克的纺织厂依然能够产生利润。社区除了 2000 名居民外，还有 500 名来自格拉斯哥与爱丁堡的贫困儿童，欧文对他们的教育非常用心。他不让孩子们到工厂工作，把他们送到他在 1816 年开办的学校里学习。欧文对资本主义竞争的控诉，对工业联合管理的强调，以及对提高儿童教育水平的倡导，为社会主义传统留下了持久的烙印。

——摘编自【美】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第五版）：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750 年至今）



▲“新和谐公社”蓝图

1825 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 120 多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名为“新和谐公社”的社会组织，进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实验。这里有工厂、农场和学校，每个人都参加劳动，分工合作，人人享有充分的、平等的民主权利。但是，“新和谐公社”脱离社会现实，最终内部矛盾激化，4 年后失败。

### 材料三：马克思主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革命时期产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1723—1790 年）是奠基者，大卫·李嘉图（1772—1823 年）把它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

财富的本原是劳动，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而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由于阶级的偏见，他们把资本家也看成是商品价值的创造者，而且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存在，即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永恒的、必要的现象，是自然不变的规律，是永恒合理的经济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利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的合理部分，批判了他们的阶级偏见的错误观点，认真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从商品关系背后，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并科学地论证出：工人所得工资只是他们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另一大部分则为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的创立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位，找到受剥削受压迫的真正原因，从而为之奋起谋求解放斗争提供了锐利武器。

十九世纪初，以法国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和英国欧文（1771—1858年）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抨击和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但是，他们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其理论不仅是空想的，而且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前进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要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任务。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社会主义制度的创造者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使命；指出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前途，这就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摘编自郑昌发、任珍良编著：《世界近代史讲话》

材料解析：早期工人运动逐渐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而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给科学理论诞生提供了思想养分。马克思主义诞生给工人阶级寻求自身解放提供了科学、锐利武器。

### 背景三：妇女权利意识的增强

#### 材料：工业革命对西方妇女观念的影响

在工业社会中，工作主宰了公共生活，男性的地位与责任提高和加大了。当生产转移到家庭之外，一些男性成为工厂的经理或所有者，而大众成为工薪阶层。妇女的工厂工作比其传统上承担的家务劳动重要得多，甚至比她们和儿童从前从事的农业劳动以及简单工业劳动更重要。男性的工资在家庭收入中占了主要部分。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男性在家庭中享有日益增加的威望，这是因为他们往往成为舒适的家庭生活最重要的供养者。

——摘编自【美】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第五版）：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750年至今）

工业革命首先给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特别机遇。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们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她们开始获得一定经济权利，并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随着妇女走向社会，社会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其经济独立也日渐形成。妇女经济独立为其独立精神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妇女而言，社会工作取代了其往日生活中家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了家庭的首要地位，从而动摇了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使之家庭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包括夫妻趋于平等现象以及夫妻平等情感的产生；妇女的婚姻观的变化——已摆脱由婚姻获得生存的命运，她们的自立使之可能甚至必然获得其婚姻的自由；生育观的变化——冲击了教会所代表的中世纪生育观束缚，表现出新形势下的新观念，即要求并习惯于避孕和节育。妇女们从内心不愿再作原先传统社会家庭中男人们的家庭奴仆，也不愿再家庭男权权威的专横下懵懵懂懂的虚度一生。从此女权意识开始萌发，妇女也有了在家庭中和男子平起平坐的愿望。

——摘编自武汉大学黄雪蓉：《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妇女家庭观念在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变化》

材料解析：工业革命改变了西方妇女的社会生活，女权意识逐渐觉醒。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经济日益独立，社会活动空间也不断扩大，逐渐形成独立精神意识。思想观念中家庭观念趋向于夫妻平等以及夫妻平等情感的产生；婚姻观念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生育观习惯于避孕和节育；整体而言，女权意识开始萌发，妇女要求与男子在家庭中实现真正平等。

### 背景四：近代中国妇女观念的演变

#### 材料一：传统社会下中国古代妇女观念

纵观中国女性的生存轨迹，在近代以前的私有制社会中……女性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因而女性只有单一的家庭角色定位，即在家中扮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相夫教子。……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长期经济生活、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

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导致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根源。（4分）

提示：根源：小农经济以种植业为主的特点；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儒家思想宣扬的纲常观念和伦理思想；传统宗法观念的影响。（4分）

### 材料二：近代社会的中国妇女观念的演变

“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养活自己呢？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

——《秋瑾集》

材料中秋瑾认为女性获得“自由的福”的条件有哪些？（2分）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原因。（6分）

提示：条件：受教育权利；经济独立。（2分）

原因：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封建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妇女传统地位受到冲击；近代企业出现，妇女走出家门就业；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和受教育权利，形成了妇女解放潮流。（6分）

### 材料三：民国家庭变迁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城市多数家庭的成员从工商业、服务业等工作中获取收入，妇女从事职业，拥有经济来源，家庭成员之间人身依附性减少。民国政府新《民法》规定离婚和结婚一样自由。燕京大学女生有96.7%的人赞成“无爱情即离婚”，上海“审判厅请求离婚案多”，而农村家庭中离婚现象则并不多见，甚至“夫可以出妻嫁妻”。

——摘编自张国刚等主编：《中国家庭史》

据材料，概括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家庭变迁的特点。并指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家庭变迁的主要因素。（8分）

提示：特点：城市家庭生计日益倚重工业经济；家庭关系趋向平等；婚姻观念日益自由；城乡家庭婚姻关系变迁不平衡。（4分）

因素：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推动；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近代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政府的法律支持与教育发展等。（4分，每点1分，答对其4点即可）

### 背景五：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

#### 材料一：辛亥革命的移风易俗

成立共和政体，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临时政府成立后，除举师北伐外，以很大力量立法建制和除旧布新，当天就宣布改用阳历。在立法中，最重要的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规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临时政府公布的法令，规定废止刑讯，人民享有选举权、参政权、禁止贩卖“猪仔”，改变“贱民”身份，男女平等。在除旧布新方面，改革社会恶习的政令有：严禁鸦片，革除前清官厅称呼，限期剪辫，禁止赌博，禁止缠足，废止跪拜，官员实行薪制等。孙中山还在致内务部令中提出官员是“人民公仆”。

还有两件事也值得注意：一是临时政府成立后，鼓励民间兴办实业，减免厘金，取消了清政府一些苛政，使社会上掀起了一个振兴实业的热潮，大量实业团体涌现出来（按：促进民国初年民资发展的短暂春天）；另一件是随着民众参政热情的高涨，入党结社蔚然成风，各种政党和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都和晚清时期不同。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上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民国年间，很多地方还是有缠足、吸食鸦片、买卖人口、溺死女婴等陋习。

——摘编自戴鞍钢：《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

需要指出的是，风俗的西化，是有“度”与“量”的限制的，并随地域的不同而不同。这里的“中俗”只是指一部分中国传统风俗，而绝非全部。另外，风俗西化在城市显于农村，在沿海显于内地。这样，中俗西化的结果是中俗、西俗在很多方面共存共容。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第4版）

## 材料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压迫妇女的批判

激进民主主义者还特别批判了封建礼教中夫权主义对妇女的摧残和毒害。陈独秀认为：封建礼教是压制妇女的精神枷锁，也是妇女独立自营生活的障碍。他指出妇女参政是现代文明妇女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封建礼教则鼓吹“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女不言外”，妇女参政在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看来简直成了“奇谈”。他还揭露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夫死不嫁”，造成许多妇女“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富有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他愤怒地谴责说：“此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摘编自姚育青、鲍鹭滨、杜益主编：《博雅育人史政学科五育融合教学集萃》

## 材料三：晚清民初以来女权运动的开展

首先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女性主要在法律层面争取参政，包括民主参与和高层次权利参与。

其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女性的参政意识提高，进入了自觉参政的深层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运动从法英美向世界传开，掀起了第一次女性参政运动的高潮，这之后，西方国家的妇女多数获得了选举权。

同样的，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末分别掀起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女子参政高潮。在这一段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推动力的言论和著作：较早的比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女子参政的理想，但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公布于众，所以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戊戌变法之后，金天翮的《女界钟》进一步提倡男女平权、婚姻自由以及女子参政；辛亥革命之后，女子纷纷组建军事团体，并在革命胜利后改名为女子参政团体，掀起了女子参政运动的高潮。

1905年，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提出了“去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思想。强烈吸引了大批的爱国妇女，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为女性解放而斗争，涌现了秋瑾、何香凝、唐群英、林宗素等一大批先进分子。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组织妇女团体，如“女子北伐敢死队”（共有七十多人，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以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占多数。）一个月后，唐群英又与同盟会会友张汉英、张昭汉等人在上海成立“女子后援会”。该会一面派人到各省为民军筹款，一面组织“北伐军救济队”，这是一支医护队。在唐群英等人的带领下，女子革命军们以及女子军团等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在这期间，唐群英等人深刻地认识到妇女的解放尤其是女子参政的重要性。所以借着辛亥革命的民主之风，她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女子参政运动：

她们上书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提出将女子参政权写入宪法。请愿书说：

“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踵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注：《女界代表张群英等上参议院书》）

1912年3月3日通过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明确的把主张男女平权，写入了同盟会政纲，并规定“会员需要选举或被选举及被委任为本会各职员”，这便为了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准备了条件。

——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37581509>，知乎网文《民国初期女性参政历史简述》

## 材料四：

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未见者也。自租界北辟，男以商贩营生而奢华渐起，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也。声气远播之后，内地妇女之妄想自由，误用自由者，逐相率至沪，父母丈夫不能阻也。

——《适可斋记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

材料解析：晚清民初的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浪潮，带来近代社会的移风易俗，推动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但是民国以来的移风易俗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有限，正如接受西方思想并积极推动男女平等社会运动的主要集中在女性精英知识分子，广大社会妇女依然处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

## 背景六：实业救国思潮的实践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 材料一：“实业救国思潮”

论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离不开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

实业救国思潮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盛行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代表人物有张謇等。在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兴办实业，提倡“商战”，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张之洞认为发展实业可以强国强民。他积极地创办铁厂、兵工厂，并筹办铁路。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家和爱国人士纷纷设厂救国。张謇创办有纱厂、面粉厂等多种企业，兴办学校，企图实现以实业所得来资助教育，用教育来改进实业，凭实业发展而救国的目标。他认为，实业和教育是国家“富强之大本”。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要道”5条：改良各种行政机关、调整统一度量货币、疏通货物流通渠道、收集才智之民归实业界、制定特别保护奖励法规；提出要扩大出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等具体办法，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论。在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论盛行不衰。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其中，在张謇的思想体系中，将棉和铁并重，大力提倡发展民族棉铁业，称这种思想为“棉铁主义”。棉铁业，就概念而言，棉主要是指棉花、棉田、棉种，也指棉纺织业；铁业主要是指轮轨机械枪炮之制造。他曾说过：“现时吾人所用之棉铁，皆来自外洋……棉铁为国家基本工商业，十年前，以国人留心者鲜，謇与前农商次长刘垣讨论有关曾著《棉铁世界》一书，冀唤起国民之注意。”

——摘编自姚育青、鲍鹭滨、杜益主编：《博雅育人史政学科五育融合教学集萃》

## 材料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

国内一些主要行业中，1912年至1919年资本万元以上的新设厂家及投资数额，分别超过以前数十年的总和。当世界第一次大战进行，外货竞争稍减时，中国民营纺织业能够趁机迅速扩张，这离不开政府大力提倡棉纺织业，诱导民营工业大力向棉纺织业发展。中国传统工业最先被洋商破坏的就是棉纺织业，故而政府不遗余力提倡发展。大型纱厂的发展沉重打击和摧毁着效率很低的传统家庭手工业，并为农村为主要销售市场的棉织工场手工业提供了廉价而充足的原料，并促使它在工业发展的大潮中，在同行竞争中向机器工业过渡。如大生纱厂自1912年至1921年，据虞和平安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一书统计，利润率平均水平高达44.44%，10年盈利累计1161万9千两，相当于1899—1911年13年纯利润总和的3.61倍。大量小型机器织布工厂的出现，是传统经济在分化瓦解中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一个例证，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商业也逐渐适应对外开放趋势，向现代化生产过渡。

——摘编自姚育青、鲍鹭滨、杜益主编：《博雅育人史政学科五育融合教学集萃》

材料解析：晚清民初的实业救国思潮，成为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资产阶级在“振兴实业，挽回权利。”的精神指引下大力投资近代机器棉纺织工厂，客观促进传统经济瓦解同时，也一定程度抵制外国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

## 二、题干逻辑分析（下面文段都与试题题干出处一致）

### 问题一：上海厚生纱厂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湖南长沙招生女工？

厚生纱厂，位于上海杨树浦，1918年6月投产，由颜料商薛宝润、贝润生等出资，以穆藕初任总经理。该厂打破惯例，率先引进美国的新式机器设备，纺出32支、42支及42支双股纱线。由于当时其他华商纱厂一般只能纺制20支以下的粗纱，“无形中厚生不啻为在华美国纺织机器之成绩展览会及实习工厂”。

1919年前后，受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国内外营商环境转好，中国民族企业呈现勃兴势头。同年12月底，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从湖南招募。按照当时惯例，上海纺织业的厂主或管理层多从其家乡，甚至同族或亲戚中招收工人。如厚生纱厂开工时，在近千名职工中，与股东、经理同籍的浦东人、江阴人、苏州人所占比重较大。这样做，企业主便于利用乡土观念管束工人。

那么，此次厚生纱厂为什么打破成规，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到湖南长沙招工呢？

原来，这件事与穆藕初手下的一名职员黄本操有关。黄本操，原籍湖南省长沙县，中学时因受种种刺激未曾毕业，忿然转去上海，进入一所职业学校——清心实业学校学习。从该校肄业后，经该校校长介绍，他到穆藕初创办的上海植棉试验场工作。在读中学时，黄本操就立志当一名工人。来到上海植棉试验场后，他夙愿得偿，欣然脱下“少爷衣服”，改穿粗糙结实的工作服，感觉“劳工实有乐趣”，后又将其从长沙县东乡高等小学毕业的妹妹介绍进厂。这时，听说厚生纱厂准备加雇人手，黄本操主动请缨，要求回湖南老家招工，并得到允准。

黄本操之所以主动申请回湖南招工，定有念及乡土、回馈家乡的成分。毕竟，久在上海，他知道厚生纱厂给出的待遇属于什么水平。

原因一：湖南长沙籍职员的主动请缨回乡招工，有念及乡土、回馈家乡的成分。

较之于同时期上海同工种女工，厚生纱厂在湖南的招工条件基本持平。在上海，1919年时，棉纺织女工的每日平均工资，最低0.18—0.2元，最高0.35—0.4元；昼夜轮班，每日工作12小时。德大、恒丰纱厂在早晚6时换班时、正午、夜半，各有15分钟至30分钟的休息时间；在国庆、令节、星期日，停工12小时休息。厚生纱厂规定，这批湖南女工日资0.3元、工时12小时等，确属上海同类企业的正常水准。

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厚生纱厂的待遇则要优越得多。因为同一时期湖南长沙纺织工人的工资数据阙如，我们暂以湖南第一纱厂1921年开工时的工资标准作参照。湖南第一纱厂规定：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隔一天增加夜班6小时；每月放假2天，不发薪；每日工资二三百文，至多四五百文。此外，该厂招男工千人左右，女工只有56人<sup>⑧</sup>。这与各国通例相较，是异乎寻常的。一般来说，女工手指纤细灵巧，工资低于男工，纺织厂更愿意雇用女工。按长沙1921年7月29日的行情，每银元合铜钱1715文。湖南第一纱厂工人日薪折合在0.117元至0.292元之间。长沙其他手工业工人，如泥木工、缝工、篾工、锯工等，在1920年初的工资与上述纺纱工人不相上下，每日所得300文至360文。长沙城周围种菜的农民，一家三口，终年无休，每日卖菜所得纯利600文左右，平均每人每天约200文。换言之，厚生纱厂给予湖南女工的待遇，与一年多后湖南第一纱厂的男女工人相比，前者的工资高于后者的最高平均工资，工作时间、假期等同样优于后者；较之于长沙的手工业工人、菜农，前者的收入同样要高得多。

黄本操还利用穆藕初的赏识和信任，准备为这批湖南女工作出特殊安排。他设想，乡间女子“纯洁而可靠”，招收女工时，必须城乡各半；入厂以后，可以专门针对这批女工设立“勤工会”，组织做饭、洗衣、缝纫、读书、写信、记账、游戏等。毕竟，当时上海要比长沙繁华、开放得多，长沙本地人难免担心这些女工到上海以后可能染上“奢华习俗”，“流为坏人”。

厚生纱厂设备新、管理严，称得上是上海的一家优秀纺织企业。该厂给湖南女工既提供难得的就业机会，又给予还算不错的工资待遇，黄本操肯定不会想到有何不妥。

**原因二：上海厚生纱厂待遇高于湖南长沙同行业的待遇水平，而且设备新、管理严，在招工者看来，是一个难得的就业良机。**

## 问题二：这份招工简章为什么引起湖南知识分子的质疑？

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第一天起，诸如贫富分化、劳资矛盾、经济危机等问题就如影随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矛盾进一步激化，并在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引发大规模的工人游行、罢工和起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走入穷途末路。劳动制度、工资制度是否合理，劳动条件是否人道等，成为全球主流知识界讨论的中心话题。

在中国国内，伴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劳资纠纷也呈现递增势头。从1917年起，上海各厂罢工的消息密集见诸各类报端。眼见西方贫富分化、劳资斗争、社会动荡，特别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刺激，时人普遍相信，中国要富强、平等，无论如何不能再走资本主义这条旧路。“想学欧美各国，利用资本主义的毒药，发展社会的经济，是断然没有的事。”否则，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对于怎样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中国知识界设想，自己应该乘产业革命未兴之机，预先调整劳资权利、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做到双方大体平等、平均。他们开始密切关注旨在救治资本主义弊端的各色社会主义学说，如无政府主义、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而劳工问题，经由上述各种主义的宣传，汇聚众多知识分子的目光。一时间，劳工被视为一切财富的创造者、“社会之柱石”，“劳工神圣”的口号风行国内。

同时，欧美各国保护劳工的最新动态，如第一届国际劳工大会（1919年底召开）通过的八小时工作制、妇女特殊保护、禁止14岁以下童工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迅速传播到国内，成为知识界观察、分析中国劳工问题的重要参照和标准。

对于上述社会主义大潮的冲击，湖南长沙的知识分子自不能免。同时，缘于各种原因，长沙知识界的思想空前解放，新村主义、工读互助思想、无政府主义大为流行。1919年底，长沙学生赵五贞在结婚花轿中割喉自杀，在当地引发一场关于婚姻自主等问题的浩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20年1月下旬。此番讨论在湖南闯出先例：“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上海厚生纱厂来到长沙招募女工，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劳动主义议题。借着招工“活事件”来讨论劳动主义“学理”，在湖南知识人眼里，无异于“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

**原因：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弊端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延伸到中国国内。一方面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府改善劳工条件，逐渐构建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是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国内学界在关注劳工问题的时候，也受到国际劳工保护动态**

的影响，因而思潮澎湃的舆论浪潮中，深受影响的湖南长沙知识界便把上海厚生纱厂这一招募简章事件作为实践运动的突破口。

### 问题三：如何看待纱厂资方的回应与由此引发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

穆藕初首先对湖南知识人的质疑逐条作出说明：厚生纱厂规定女工在应招时，须填写志愿书，并由家长署名和铺保，这属于中国传统的招工办法；给予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并没有有意压低；工时长，缘自中国人口众多、工业衰微、投资环境恶劣、工人工作能力“幼稚”，厚生纱厂非如此规定，难以与英、美、日等外国纱厂竞争；工厂卫生问题属各国普遍现象，厚生纱厂已尽最大努力改善之；医药抚恤方面，工厂早已作出周全安排；等等。

穆藕初的上述解释有一定道理。因为主义不同，受到主义影响的参考标准不同，对工人待遇优劣的衡判可能大相径庭。再者，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工人忍受低工资、长工时、弱福利的煎熬，在大多数地区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基本上很难避免，尽管这些现象并不人道，应该受到道德谴责和理论批判。

与柏荣等人不同，穆藕初并非纯粹的知识人。他出国留学，目的在“用”；回国办厂，在理想背后考虑更多的是现实可行性；更重要的是，他从西方拿来的救国宝典，是创办实业。再加上坎坷的早岁社会经历和丰富的公司治理实践，穆藕初自觉湖南知识人事理皆错。他分析说：柏荣、负庵等人之所以提出诸多疑问，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曾实地考察、真正研究过“民生之现状及工厂之真相”。换言之，他们一不懂“劳动问题之精义”，二不识“资本家压迫劳动家”的各种秘密手段，三不知中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四不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五不明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仍不及工人，六不思中国为何出现内需、自给双双不足的困境。穆藕初还讥讽说：湖南知识人正是缘于上述缺陷，才会囫圇吞枣，拿来西方的某些思想资源，“趁快一时，发挥不负责之论调”；而这些批判的武器却是“泰西之糟粕”，与拯救中国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等于“自杀主义”。在这篇“总解释”的末尾，穆藕初自信满满地强调：“救国爱群之要道，固在此不在彼。”

确实，论抱负和目标，穆藕初与湖南知识人毫无二致，同样是“救国爱群”。可要说“救国爱群之要道”，却是南辕北辙。对各自摸到的“要道”，双方都以为是正义的、正确的，都希望说服对方转到自己的“要道”上来。共识难以达成，争议只能继续。

材料解析：不难看出，穆藕初作为资方代表，与知识界一味从理论层面进行批评质疑不同，他更侧重于实业救国的实用性。应该说，穆藕初所言并不全然没有道理，作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初期的近代中国，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问题，如低工资、长工时、弱福利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不可避免的。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在无产阶级不断斗争中逐渐促使政府立法改良而逐步改善。但是，同样抱着爱国救亡路径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两端，都坚持己方的正确性，殊途本可以同归，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陷入持续争论。

穆藕初没有料到，他的这种“总解释”矛头直指青年人热捧的社会主义学说，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一方面，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大多比穆藕初年轻 20 岁左右，知识结构和观念大多要“进化”一两代，还掌握着各地区以至全国的时代话语权。这似乎注定是一场胜负毫无悬念的论战。另一方面，柏荣等青年人毕竟集聚在湖南一省，处于全国新知识群体的边缘，争论尚未溢出湖南。穆藕初讥讽劳动主义，等于向整个新知识群体，无论边缘的还是核心圈的，一概发出挑战书。一波范围更大、更猛烈的批评，汹汹而来。

相对于前一阶段湖南知识人的“请愿”“质问”，这一轮批评的思想资源不再限于“劳动主义”“劳工神圣”等，而来自更丰富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攻击的矛头也不再限于厚生纱厂及其经理穆藕初，而是针对所有的资本家群体；批评的内容不再限于工时短、工资低等苛待女工的具体问题，而是更猛烈地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批评者的眼里，清末民初时，实业家备极荣耀；可现在，这个群体已被换上资本家的头衔，被贴上清一色的“掠夺者”“剥削者”符号。他们“仅知铜臭”“贪得无厌”，任意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把工人当成牛马和摇钱树；工人却生活困苦不堪，日益失去做人的尊严。因此，“劳动家”与“资本家”才会形成对立之势。沪湘知识人纷纷警告道：资本家应该觉悟过来，主动改变分配制度，增加就业机会，缩短工人工作时间，否则，固守“工银制度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怠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沪湘两地知识人呼吁资方无条件改革劳动制度，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他们推演道：只要资本制度存在，只要资本家愿意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就肯定能获利无数。朱执信曾分析指出：穆藕初等人鼓吹“振兴工业”“提倡实业”，实际上就是做生意。既然做生意，肯定不可能“牺牲了自己来利益社会”，何况“还是拣最好做的生意来做”。1919 年，中国各纱厂所获利润多在 100% 左右，甚至 2 倍余，可谓空前。穆藕初经营的厚生纱厂，盈利银

45 万两，利润率 38%，已属最低者之一。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暗想，增加工人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以及多买机器、多雇工人（以不开夜班），工商业经营不会有什么困难，资方仍然有利可图。对此，“真心”讲得最直白。他诘问说：“你们当资本家的，总得要想想，你们每年的净盈利，不是几万几十万吗？这几万几十万，不是许多工人拿劳力替你们换得来的吗？为什么你们总不愿意多给他们几个钱呢？”“资本家少赚几个钱，又何害于实业的发展？”

材料解析：在上海湖南知识界新一轮的批评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带来的深远影响。知识分子从该事件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等理论武器，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尖锐批评。某个层面而言，知识分子的这一觉醒，也预示着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即将走进历史舞台。

#### 问题四：该事件最终为什么得以平息，说明理由？

在这次争议中，湖南女工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劳工的待遇如何，毫无疑问是争议的焦点。湖南知识人呼吁的目的，也是为这些女工争取更好的待遇。吊诡的是，读到柏荣等人连篇累牍的文章，当地的女孩子们仅仅产生过轻微的犹疑，报名热情基本没有受到妨碍。本来，报名期限只有三天，“还没到招工截止的期间，便争先恐后报名到一百余人，甄别以后，仍有七十余人”其中，数名学生年龄小、体力弱且未得到家长同意，却不顾黄本操的劝阻，执意要到上海厚生纱厂工作。近一个月后，这批女工从长沙启程时，最初报名核定的 73 人仍余下 64 人，只有 9 人打退堂鼓。她们的行动表明，理论上应该对立的劳资双方，有时似乎也不尽然。

长沙的这些女孩子们为什么不为柏荣等知识人的言论所阻，至少目前尚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从理性人的角度推断，她们踊跃报名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对于柏荣等知识人的疑虑，如工资少、工时长、倒班累、动作机械、合同死等，这些将来的女工肯定也想改善。关键在于，眼下怎样摆脱贫困、能够谋生，才是她们的第一要务。到工厂，特别是到上海的工厂做工，属于比较理想的选择之一。当时，在上海杨树浦一带，纺织厂林立。当地人得近水楼台之便，相率到工厂做事。结果“自从各工厂发达以后，一般劳动家的经济，很觉宽展”。其次，在 20 世纪头十年后半叶，中国的棉纺织业发展迅速，成为最大的工业行业。相应地，在该行业就业的工人数量也最多，大概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 1/4。这种需求量极大、又没有季节性限制的职业，对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孩子来说极具诱惑力。当时，社会劳动力供给充裕，纺织厂工人确实倍加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时刻提防别人抢她们的饭碗。至于工厂工作的诸多艰辛、痛苦乃至被“压迫”“剥削”，肯定是应受到批判的。可对于长沙的女孩子来说，这些只能算是下一个阶段的烦恼。湖南知识人大倡的劳动主义，对于这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根本未曾上过学的女孩子们来说，差不多等于天方夜谭。希望她们在忍饥挨饿之时，去思考这些填饱肚子之后的宏远目标，并不现实。

耳闻目睹这些女孩子们不为所动的情况，招工批评者之一弗兰克大失所望。他颇为沮丧地写道：“像湖南这样生计困难，莫说只招五十名，就是要招五百名也有；莫说每月有八元的工食，就是更少一点，也有人愿意去；莫说每日做工十二时，就是再长一点，去的人也不得怨劳苦。因为各人只自揣暂时可以解除生计上的困难，日后的怎样，恐怕未研究过。”

这些女孩子们的态度，亦可从一位家长——叶之乔的反应中得到解释。在厚生纱厂招募的这批湖南女工中，有一个女孩名叶雪珊，其父叶之乔，时年 46 岁，曾任职于长沙的私立自治女子职业学校，当时在上海工作。从湖南《大公报》、女儿来信及旅沪同乡等处，叶之乔闻听长沙的争议，感到无法坐视不理，便立刻在除夕那天（1920 年 2 月 19 日）前去拜访穆藕初。第二天正是春节，由熟悉工厂事务的朋友陪同，叶之乔亲自到纱厂参观。他发现，厚生纱厂厂房“俱照西式”，宏大宽阔，空气流通，卫生条件颇佳；附设医院，随时可以就医；女工工作，除摇纱“需略用腕力外，绝无痛苦之运动，行坐自由”，织布工还“甚有兴味”；初做夜工，肯定觉得辛苦，时间一长，也能适应。总之，厚生纱厂属于一家“极有秩序、极有计划与发展之工厂”。叶之乔与柏荣等人一样，同样是湘籍知识分子，可他非但对厚生纱厂没有丝毫批评，反而向那些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求学的高小女学生积极推荐该厂。他还暗含讥讽地说：那些“为劳工神圣之学说刺激脑筋”者，可以到厚生纱厂作一个劳工啊！作为一个父亲，对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湖南女孩子应聘厚生纱厂，叶之乔深表赞同，不会觉得这可能有自己的害于自己的孩子、乡亲。他作出这种判断并不是一时冲动，出发点主要是眼下的现实，考虑的主要因素应是该厂工作环境、待遇与自身经济条件、可能的出路等。

理由一：其一从理性角度分析，限于知识文化水平，湖南应聘的女孩子更多思考的是上海厚生纱厂的优厚待遇，思量更多依然是眼前的生计问题。其二从现实条件而言，厚生纱厂当时设备先进、管理严格，条件在同行业中处于比较优异的地位，且处于工商业繁荣的上海地区，对经济比较落后的湖南女孩子不啻有巨大的吸引力。最后从工商业发展而言，20 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方兴未艾，对劳动力的需求缺口巨大，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也自然会趋之若鹜。

至于知识界振臂疾呼，痛陈招工简章中种种对女工的“不公正待遇”，缘何没有引起湖南女孩子们的积极回应，这个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唯一可以推断的是，知识界的批评缺乏实际的证据支撑，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况且应聘女工家长之一就曾就职学校，并亲自参观女儿应聘劳作的厚生纱厂，表示赞同和满意。由此综合而言，湖南女孩子积极应聘女工，主要着眼与现实生计问题，至于知识界所高谈阔论的“劳工自由”等，尚无法引起她们的共鸣。

就在上海、湖南知识分子对穆藕初等实业家群体口诛笔伐期间，3月10日，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募的女工抵达上海。这一天，张默君公开披露说：厚生纱厂给予这批女工的工作条件，“据闻颇为苛刻”；其中，某女子师范学校肄业及女子中学毕业生数人，并未征得其家长同意，且年龄幼小，“按其体力不能工作”。张默君，辛亥革命前后即参加革命，创办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与神州女学校，在1918年到1919年11月间，曾奉派到欧美考察学习职业教育，可谓当时妇女界的风云人物之一。

以前，针对其他人质疑自己，穆藕初也作过解释，结果基本上风平浪静。他没想到这一次“总解释”会引起这么激烈的舆论反弹，演变成不利于己的“一边倒”局面。只有湖南《大公报》编辑“詹詹”，站在中立立场，对穆藕初与柏荣等湖南知识人各打五十大板。无可奈何之下，考虑到张默君熟悉西方职业教育，穆藕初便修书邀请其亲临厚生纱厂以探明究竟。在信中，他未作争辩，而是一味地诉苦说：他人的种种责难，本非自己本心，可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张默君接信后，又赶上旅沪之湘绅纷纷前来相商救助这批女工的办法，便很快于3月16日到厚生纱厂参观。她发现，厚生纱厂“建筑尚法效新式，各工作间空气亦不甚恶劣。各湘女工正在学习纱工，睹女士至皆喜形于色，围告来申后情状……其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只有数名女学生的确不堪劳苦，要求帮助。两天后，她立刻在自己编辑的《时报》“妇女周刊”版登载一文，公开上述见闻。在这篇报道的末尾，她意味深长地介绍说：“女士（指张默君——引者注）并对厂中执事及工人等演说，喻以劳工神圣之义，一面勉工人群力合作，一面劝厂主对于劳动者智识身家等有以补助，如劳工补习所、儿童公共保育所、义学、医院等，宜设法多设。”张默君系湖南湘乡人，社会影响力非同小可。现在，她一改先前对厚生纱厂尽是怀疑、指责的态度，大体表现得不偏不倚，甚至颇像在“说好话”。这就一锤定音，为这轮争议划上句号。

理由二：受穆藕初书信邀请，湖南籍妇女界名人张默君亲自奔赴厚生纱厂参观，观后给予客观肯定，一改先前的怀疑、指责的态度，事实上起到平息争议的作用。

### 【命题立意】

本题着眼于聚焦一个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史事发展经过，通过展现所在时空特定社会人群在此事件前后的不同反应，分析这些反应背后的原因，并作出合理的评价。

题干信息的时空尺度切口在20世纪20年代的沪、湘两地，涉及的重大史事包括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资本主义短暂春天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等。题干聚焦围绕一则上海厚生纱厂的招工简章而引发的社会舆论风潮，资、劳、学三方涉足其中。具体而言，资方站在实业救国的立场上，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国情，注重实用改良；学界深受马克思主义等影响，注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推崇社会革命倾向；劳方则是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普通女孩，着眼更多是生计问题，对资方和学界的争论并不敏感。

由此，笔者认为本题评析的作答应把握如下几个层次：

其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定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在争论中，知识界秉持马克思主义，展开口诛笔伐，缘何科学理论为武器，却没有完全占据道德制高点？事实说明，科学理论也需要和具体国情相结合，这也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断走向成熟，最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必由路径。同理，厚生纱厂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缘何在知识界口诛笔伐下，依然能得到认同？无他，民族资本主义固然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弊端，但是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对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客观上是积极进步的力量，对推动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二，注意联系中外时空。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救亡图存运动波涛翻涌，高潮迭起。国内的一系列救亡政治、文化运动与世界大势紧密关联。因此在评析这一争议时，各方所持观点背后所蕴含的中外时空关联要分析到位。如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知识界的影响。

其三，聚焦个体人物变化。

诚如康有为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为其思想“流质多变”，历史时空的人物总会受到具体环境的影响，其言行思想不可能始终一成不变。本题中如知识界的张默君女士，其对厚生纱厂的态度前后反差极大，正好体现了通过实践而产生的思想变化。张女士这一转变，也正是最终平息舆论争议的重要促因。

综上所述，在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各种救亡思潮风起云涌，实业救国、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是本题呈现的两端。在题干中，其两端通过厚生纱厂的民族资本家和舆论批评的知识分子群体呈现在考生面前。评析并不是要比较两种救国道路孰优孰劣，而是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价。再从湖南应聘女孩对该争议的态度中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中的嬗替并存，传统社会的影响依然是深远的。民国下的中国，新旧思潮碰撞同时，普罗大众在关注生计同时，也不知不觉间融入社会的转型，见证一个时代的变迁。

#### 【参考书目】

李国芳：《一九二〇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中共党史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

【美】本特利、齐格勒著：《新全球史》（第五版）：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750 年至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郑昌发、任珍良编著：《世界近代史讲话》，甘肃人民出版，1988 年 2 月。

姚育青、鲍鹭滨、杜益主编：《博雅育人史政学科五育融合教学集萃》，鹭江出版社，2023 年 7 月。

其余文献参考出处请查阅正文。